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理及经验证据

唐任伍 马志栋

内容提要: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数智化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手段,以数智化为核心特质的平台经济逐渐成为大数据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本文首先以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为依据,从理论层面分析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而后运用综合评价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与指数测算,进而对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及经验证据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 平台经济 城乡融合 数字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04-0061-16

一、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乡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乡村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元素在未来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数字化、智能化逐渐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5]。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数字乡村”的概念^[6]。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7]。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在实施层面完善了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体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8]。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平台经济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平台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的新业态,具有长尾效应、规模效应、范围经济、网络效应等特征,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消费者剩余、规避经营风险^[9]。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基于市

收稿日期:2024-09-02;修回日期:2025-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18ZDA012)

作者简介: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马志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场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庞大的人口基数、广泛的数字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政府的政策鼓励,中国数字平台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前列^[10]。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为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平台经济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可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全国农村网商(网店)已达1730.3万家;2023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1%^[11]。平台经济开创了线上线下融合经营的新模式,能够为农业发展解决技术与经济难题、为乡村特色产业推广拓展新渠道、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新路径,是大数据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12]。分析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起源于21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罗歇和梯若尔(Rochet & Tirole, 2003)^[13]首次提出并定义了平台经济的基本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掀起了对平台经济研究的热潮。罗歇和梯若尔(Rochet & Tirole, 2003)^[13]、卡约和朱利安(Caillaud & Jullien, 2003)^[14]、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2006)^[15]认为平台经济通过“双边市场”模式为平台吸引或培育用户,进而推动平台业务顺利开展^[14]，“双边市场”的特征为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另一方的数量规模。他们认为平台经济中包含两类用户,均通过平台与另一方交互获利,并且把网络外部性看作是平台经济的理论基础^[15]。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所处的经济环境有差异,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因而国内学者对平台经济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贺宏朝(2004)认为平台经济是多方参与者组成的竞合系统,它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16]。史健勇(2013)认为平台经济是平台运营者遵循平台运行规则,依托信息技术开发,集聚要素资源,让平台参与者获利,同时也让自身持续增值的经济业态^[17]。谢富胜等(2019)认为,可以收集、处理并传输经济活动信息的数字化设施是数字平台,运营并使用数字平台的组织是平台组织,平台组织在经济活动中与其他主体经济联系的总体是平台经济^[18]。

国外关于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少,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涉农平台经济、直播助农、平台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等。芦千文(2018)认为涉农平台主导形成的农业农村产业生态系统,为数据等现代要素进入农业农村生产领域提供了载体,为传统农民衔接现代农业提供了渠道,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19]。袁宇阳(2023)认为平台经济日益壮大,使得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逐渐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依托短视频平台,以乡村社会为实践场域,通过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模式,促进了农民身份、农产品销售模式以及农村社会关系的再造,促进了乡村振兴^[20]。朱冬睿(2023)认为平台经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市场规模等,从而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21]。

总之,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或是只分析了平台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某一模式,或是只分析了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某一方面,缺少关于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也缺乏对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理与经验证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入分析了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经验证据。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平台经济、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应用与延伸了技术-经济范式、数字治理、乡村治理等理论,为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实证支撑。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效实现了农村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经济模式的有机融合,成为农业领域、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体现。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技术变革不仅会引起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而且会带来传统产业的复苏,传统产业受新兴产业的影响,找到了利用新技术进行管理变革的方法^[22]。数字技术正在引发技术-经济范式的重大变革,造就生产要素、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模式等方面的重大革命,将人类带入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经济发展时代。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技术革新催生的新兴形态,借助数字要素优势迅速发展,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经济发展和模式变革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 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其直接影响表现为:拓展乡村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乡村传统产业中,有效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推动乡村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焕发新活力^[23],使得乡村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突破乡村传统产业“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12],催生乡村振兴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平台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绿色、低碳、环保、智能的特质,能够降低粗犷的农业生产能耗,其便捷性提升了乡村环境治理效能,有效促进了乡村绿色产业发展以及绿色乡村建设,赋能乡村生态宜居。互联网平台一方面拓宽了乡村居民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风文明。平台经济在乡村的发展,加快了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互联网+乡村治理”的形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现代化治理。平台经济为乡村人口创造了线上就业、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模式,线上就业使乡村劳动者不必物理流动就能实现就业^[24],灵活就业模式使就业结构由“公司+员工”模式逐渐向“平台+自由职业者”模式转变,使村民能够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方式增加额外收入^[9],拓宽了农村人口的就业与致富渠道,促进乡村居民生活富裕。

但是,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平台垄断、平台歧视、平台剥削、数据安全等数字伦理问题^[10],会制约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甚至会抑制乡村振兴。数据和数字技术具有长尾效应、网络效应和虚拟性,平台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特点,比如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参与主体具有虚拟性、交易方式具有多样性、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等,加之平台经营者责任缺失、平台设计者社会责任意识薄弱、平台用户自我保护意识缺乏,助长了平台经济的失范,为平台经济数字伦理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降低了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果。例如,平台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但是随着农村电商和物流的快速发展,包装废弃物和运输污染等问题逐渐凸显,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压力,削弱了生态宜居的效果。又如,平台经济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会,数字技术的应用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信息传播和知识共享,但是网络平台的普及也向乡村渗透了不良文化内容,冲击了乡风文明。平台经济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增收渠道,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电商平台的运营成本和市场竞争可能导致部分农民收益不稳定,影响了生活富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H1a:乡村振兴与平台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

H1b:乡村振兴与平台经济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

(二) 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间接影响

平台经济的联通效应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较慢的乡村和城市建立起联系,以获取更多的机会和信息。具体而言,平台经济推动了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使得城乡界限日趋模糊,形成互动共赢的新局面。产品设计、管理控制等环节向资源集聚的大城市转移,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等环节向乡村地区转移,平台经济使城市和乡村在产品价值链上分工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产业错位发展、要素合理流动的新型城乡分工格局^[9],充分发挥了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对乡村地区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关键^[12],促进了城乡之间资源、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互补共享,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一,城乡融合促进城市的技术、资本和市场优势与乡村的资源禀赋相结合,推动城市产业向乡村延伸,促进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优化乡村产业布局,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推动了产业兴旺;第二,城乡融合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将城市的绿色发展经验、生态治理技术引入乡村,促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第三,城乡融合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城市文化的传播提升了乡村居民文化素养,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城市文化注入新活力,城乡间文化互动丰富了乡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方法,促进了乡风文明;第四,城乡融合打破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治理体系,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增强了乡村治理效果;第五,城乡融合优化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小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不仅提升了乡村居民生活质量,还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促进了乡村居民生活富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平台经济通过推动城乡融合间接促进了乡村振兴。

(三)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区域异质性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其能量主要来源于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平台应用水平以及平台经济交易水平。由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各省份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平台应用水平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由于中国不同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平台应用水平等优于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人口密度较高、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更好。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赋能效果更好。

四、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取

1. 指标测算方法

本文以数据的权威性、可得性为原则,选用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各省份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份的统计年鉴等。为避免指标权重主观性,增加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并参考郭芸等(2020)^[25]、杨伟国和吴邦正(2022)^[26]、费威等(2022)^[27]的计算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X_{i,t,j} = \frac{x_{i,t,j} - \min(x_{i,t,j})}{\max(x_{i,t,j}) - \min(x_{i,t,j})} \times k + q \quad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_{i,t,j} = \frac{\max(x_{i,t,j}) - x_{i,t,j}}{\max(x_{i,t,j}) - \min(x_{i,t,j})} \times k + q \quad (2)$$

其中, $x_{i,t,j}$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第 j 个指标, $X_{i,t,j}$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第 j 个指标的无量纲化变量, $\max(x_{i,t,j})$ 表示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 $\min(x_{i,t,j})$ 表示指标数据中的最小值,用常数 k 、 q 将转化后的数据分布区间设定为 $[0,100]$ 。

第二步:计算指标比重。计算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第 j 个指标所占比重:

$$P_{i,t,j} = \frac{X_{i,t,j}}{\sum_{i=1}^N \sum_{t=1}^T X_{i,t,j}} \quad (3)$$

其中, N 表示省份数量 31, T 表示年数 8。

第三步:计算信息熵。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

$$E_j = -\frac{1}{\ln NT} \sum_{i=1}^N \sum_{t=1}^T P_{i,t,j} \ln P_{i,t,j} \quad (4)$$

其中, $E_j \in [0,1]$ 。

第四步:计算信息熵冗余度。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d_j = 1 - E_j \quad (5)$$

第五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6)$$

其中, M 为指标个数。

第六步:计算综合指数。计算第 i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综合指数评分:

$$S_{i,t} = \sum_{j=1}^M w_j X_{i,t,j} \quad (7)$$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关于平台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大多从平台基础设施水平、平台交易水平、平台创新水平、平台化产品发展水平等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28]。由于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本文参考纪园园等(2022)^[28]、颜长春和廖俊(2023)^[29]、沈坤荣和张锐敏(2023)^[30]关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并进一步进行调整与优化,在梳理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数字经济的概念中剥离出平台经济,对平

台经济的范围进行界定,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29]。

本文设置3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平台应用水平、平台交易水平。平台基础设施是平台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关键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28],包括人均光缆线路长度、人均互联网域名数、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3个三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平台应用水平是平台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平台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销售、流通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对平台基础设施的应用,包括4个三级指标,即人均电信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计算机普及率、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均为正向指标;平台经济作为协调资源配置、提供交易场所的一种经济业态^[30],交易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平台经济发展状况最直接的指标,包括4个三级指标,即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占比、电子商务销售额、人均快递量、电子商务采购额,均为正向指标。表1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出的各项指标权重分配。

表1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人均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正向	6.892 1
		人均互联网域名	个	正向	23.078 0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个	正向	4.834 8
	平台应用水平	人均电信业务量	元	正向	17.380 9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正向	4.189 6
		计算机普及率	台/百人	正向	6.621 0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户	正向	4.276 7
	平台经济交易水平	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占比	%	正向	4.294 9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正向	2.199 4
		人均快递量	件	正向	25.197 6
		电子商务采购额	亿元	正向	1.035 0

3.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乡村振兴水平(*Rural*)。关于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测度的研究文献很多,对于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虽未形成统一定论,但绝大部分学者都是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五个方面出发构建^[31]。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张挺等(2018)^[31]、闫周府和吴方卫(2019)^[32]、毛锦凰(2021)^[33]关于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的观点,根据本文研究内容进行调整,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设置的,包括5个二级指标。产业兴旺包括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农业机械平均动力、土地生产率这3个三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生态宜居包括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农村用电量2个三级指标,均为负向指标;乡风文明包括乡镇平均综合文化站数、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3个三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治理有效包括村民委员会与村民数量比、乡村人均养老服务机构数2个三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生活富裕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个三级指标,除恩格尔系数外均为正向指标。表2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运用熵权法计算得

出的各项指标权重分配。

表 2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乡村振兴水平	产业兴旺	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	万元	正向	8.268 7
		农业机械平均动力	千瓦	正向	12.159 1
		土地生产率	%	正向	17.338 3
	生态宜居	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	万吨	负向	2.056 8
		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时	负向	1.834 1
	乡风文明	乡镇平均综合文化站	个	正向	1.681 5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	正向	8.558 6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	正向	8.957 7
	治理有效	村民委员会与村民数量比	个/万人	正向	11.042 2
		乡村人均养老服务机构	个	正向	12.951 1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7.998 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正向	5.502 6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负向	1.650 6

4. 控制变量

为了在研究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Plat*) 对乡村振兴水平 (*Rural*) 的影响中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本文参考周兵等 (2023)^[34]、李雪等 (2024)^[35]、程聪慧和刘昱呈 (2024)^[36] 的研究及其测算方法,并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选择各省份的人口规模 (*Popul*)、教育水平 (*Edu*)、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Trans*)、失业率 (*Unem*) 4 个指标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人口规模、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失业率能够影响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人才质量、流通效率、村民生活等方面,因此上述 4 个变量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振兴水平造成影响。其中,人口规模 (*Popul*) 用各省份年末常住人口衡量,教育水平 (*Edu*) 用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量取自然对数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Trans*) 用地区公路里程衡量,失业率 (*Unem*) 用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数之比衡量。

5. 机制变量

根据上文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间接影响机制的分析,并参考田野等 (2022)^[37] 的研究,本文选取城乡融合水平 (*URI*) 为机制变量。参考周佳宁等 (2019)^[38]、孙群力等 (2021)^[39] 的研究,选取城乡人口融合水平、城乡空间融合水平、城乡通信融合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城乡融合水平 (*URI*)。城乡人口融合水平用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城乡空间融合水平用土地城镇化率来衡量,城乡通信融合水平用农村投递路线长度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熵权法计算城乡融合水平指数。

综上,本文的变量定义如表 3 所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

表 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i>Rural</i>	乡村振兴水平	熵权法计算得出
核心解释变量	<i>Plat</i>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熵权法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	<i>Popul</i>	人口规模	年末常住人口
	<i>Edu</i>	教育水平	每十万人人口高校在校生数取对数
	<i>Trans</i>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地区公路里程
	<i>Unem</i>	失业率	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数之比
机制变量	<i>URI</i>	城乡融合水平	熵权法计算得出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中位数
<i>Rural</i>	248	27.430 6	8.564 8	59.971 8	9.509 9	26.284 4
<i>Plat</i>	248	19.930 7	3.093 6	67.570 8	13.012 5	16.203 9
<i>Popul</i>	248	44.875 8	3.170 0	126.240 0	29.209 2	38.795 0
<i>Edu</i>	248	7.849 3	7.057 9	8.606 9	0.275 8	7.818 2
<i>Trans</i>	248	15.292 1	1.260 0	39.440 0	8.125 9	15.780 0
<i>Unem</i>	248	3.204 4	1.200 0	4.600 0	0.632 8	3.300 0
<i>URI</i>	248	27.041 8	4.083 6	77.981 7	16.790 7	21.789 9

(二) 模型构建

为测度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Rural_{i,t} = \alpha_0 + \alpha_1 Plat_{i,t} + X'_{i,t} \beta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8)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 $Rural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省份 i 在 t 年的乡村振兴水平指数; $Plat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省份 i 在 t 年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X'_{i,t}$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人口规模($Popul$)、教育水平(Edu)、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ns$)、失业率($Unem$);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δ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 基准回归

本文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应和对所有个体都有影响的时间特定效应,提高估计的准确性,选择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为避免面板数据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参考赵云辉等(2019)^[40]的做法,在进行回归前通过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多重共线性程度,结果显示本文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与平均值均远小于10,即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指标选取合理。表5是模型(8)基准回归的结果,其中列(1)为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的结果,列(2)为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的结果。

表 5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Plat</i>	0.438 1*** (0.031 2)	0.172 4*** (0.049 5)
<i>Popul</i>	0.120 8*** (0.017 7)	0.225 3* (0.114 8)
<i>Edu</i>	3.608 4** (1.451 0)	0.151 6 (2.139 6)
<i>Trans</i>	-0.526 2*** (0.065 9)	-0.218 2* (0.128 6)
<i>Unem</i>	-0.371 4 (0.563 7)	-0.047 0 (0.378 8)
常数项	-5.809 3 (11.239 9)	13.797 7 (15.702 7)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48	248
R^2	0.698 3	0.855 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固定效应时显著,控制时间与地区固定效应后不显著,说明教育水平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够明显。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教育水平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41]。第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ns*)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各个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乡村振兴水平提升具有负向作用。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42],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反映的是整体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并不代表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也不必然带来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第四,失业率(*Unem*)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失业率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较小,原因可能是失业率难以反映乡村失业状况。

(二) 内生性分析

由于乡村振兴与平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较难计量,并且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互为因果等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内生性分析。前文已经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一些处理,比如:第一,引入了人口规模、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失业率4个指标为控制变量;第二,在进行基准回归时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但是,为检验互为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是否存在,仍需进一步进行内生性分析。

本文参考沈坤荣和张锐敏(2024)^[43]的内生性分析做法,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分析,参考黄群慧等(2019)^[44]的方法,选用各省份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构造基础。由于该数据为截面数据,本文进一步参考肖远飞等(2024)^[45]的方法,选用各省份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当年邮政业务总量的交互项作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

列(1)回归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438 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情况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乡村振兴水平提升。列(2)回归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72 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仍促进乡村振兴水平提升,且 R^2 比未控制固定效应时高,拟合效果更好。表5回归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有效赋能乡村振兴,验证了假设H1a。

进一步分析各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第一,人口规模(*Popul*)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分别在1%、10%的水平下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地区人口规模越高,乡村振兴水平越高。第二,教育水平(*Edu*)的回归系数在未控制时间与地区

表6为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84 0,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477 6,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第一阶段的 F 统计量大于10且 P 值为0.000 0,表明工具变量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满足相关性要求。不可识别检验的Anderson LM 统计量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内生性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H1a。

表6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V	0.084 0*** (0.016 9)	
$Plat$		0.477 6*** (0.164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3.931 7*** (20.453 0)	
Anderson LM	26.651 8 [0.000 0]	
Cragg-Donald Wald F	24.685 3 {16.380 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48	248

注:[]内数值为 P 值,{ }内数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Plat$	0.160 3*** (0.049 7)	0.207 6*** (0.056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115 8 (15.733 8)	-4.531 3 (18.685 7)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48	186
R^2	0.854 3	0.826 0

注:列(1)、列(2)分别为缩尾处理、改变样本周期的回归结果。

结果。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207 6,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仅考虑2014—2019年,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的幅度更大。

从表7回归结果来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振兴水平影响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表5的回归系数在方向上保持一致,表明缩尾处理、改变样本周期均不会改变上述结论,即平台经济促进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参考王菲等(2023)^[46]的做法,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缩尾处理。本文通过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来避免极端数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具体做法为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然后进行回归。第二,改变样本周期。本文通过改变样本周期,剔除2013年和2020年的样本,选择2014—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以检验稳健性。表7为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列(1)、列(2)分别表示采用缩尾处理、改变样本周期两种稳健性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

列(1)是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160 3,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去除极端数值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的幅度变小,极端数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归结果。列(2)是改变样本周期,选择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

乡村振兴,验证了本文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四) 机制分析

为测度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间接影响,进一步以城乡融合水平为机制变量,参考江艇(2022)^[47]的机制分析方法,进行机制分析。本文构建模型(9),实证检验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若系数 β_1 显著,则表明城乡融合水平是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变量,即假设 H2 成立。

$$URI_{i,t}=\beta_0+\beta_1Plat_{i,t}+X'_{i,t}\boldsymbol{\beta}+\mu_i+\delta_t+\varepsilon_{i,t}$$

(9)

其中, $URI_{i,t}$ 为机制变量,代表省份*i*在*t*年的城乡融合水平,其他变量和参数的含义与前文一致。机制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i>Plat</i>	0.111 7** (0.055 2)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34.545 6** (17.517 6)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量	248
<i>R</i> ²	0.629 3

如前所述,城乡融合是“三农”工作的重要方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与基础条件。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对乡村振兴促进作用具体体现为通过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供给创新^[48]激发乡村内生动力,逐步建立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人地系统的优化,促

进乡村振兴。表 8 中,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的回归系数为 0.111 7,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平台经济促进了城乡融合,假设 H2 得到验证。本文认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城乡间存在数字平台建设和应用等方面的数字鸿沟^[10]。

(五) 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来考察不同地区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由于本文聚焦于分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情况,因此参考孟维福等(2023)^[49]的异质性分析方法,将 31 个省份分别划分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进行分析。

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水平总体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东高西低”态势^[50],本文借鉴程名望等(2018)^[51]的做法,以胡焕庸线为划分标准,将中国 31 个省份分为东部、西部两个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关键^[52],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发达,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 24 个省份;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欠发达,包括青海、甘肃、新疆等 7 个省份。南北差异也是地域差异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本文参考冯苑和聂长飞(2022)^[53]的方法,以“秦岭—淮河”线将中国 31 个省份分为南方、北方两个地区。北方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经济相对欠发达,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 14 个省份;南方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经济相对较发达,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等 17 个省份。参考李征召等(2024)^[54]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方法,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法进行检验。表 9 为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列(1)—列(4)分别表示东部、西部、北方、南方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9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按东西部划分地区		按南北方划分地区	
	(1)	(2)	(3)	(4)
<i>Plat</i>	0. 164 9 *** (0. 055 2)	0. 372 7 *** (0. 129 7)	0. 212 0 *** (0. 067 9)	0. 097 8 * (0. 058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2. 838 2 (18. 778 5)	40. 790 1 ** (19. 826 2)	24. 335 7 (26. 813 6)	80. 230 6 *** (19. 862 5)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2	56	112	136
R^2	0. 864 2	0. 940 0	0. 865 8	0. 906 3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094 8 *		0. 132 1	

注:列(1)—列(4)分别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样本;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方法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进行 500 次自助抽样。

列(1)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 164 9,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回归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 372 7,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东部地区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小于西部地区,经由费舍尔组合检验法得到的经验 *P* 值为 0. 094 8,进一步证实了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组间系数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列(3)回归结果显示北方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 212 0,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4)回归结果显示,南方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t*)对乡村振兴水平(*Rural*)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 097 8,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南方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小于北方地区,且显著性低于北方地区,经由费舍尔组合检验法得到的经验 *P* 值为 0. 132 1,这表明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南北方差异较小,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南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与结构差异小于东西部地区,平台经济共享水平较高,且南北方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结构性差距呈缩小趋势^[55]。

表 9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人口密度较高的经济较发达地区,还是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平台经济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振兴。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大小、显著性以及组间系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与程度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更好。假设 H3 未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存在区域异质性,但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效果优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产出递增和要素互补性理论,当一个地区某种生产要素充足而另一种生产要素不足且这两种生产要素存在互补关系时,增加后者生产要素的投入可能会因为前者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而带来较高的边际产出。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乡村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相对充足,而数据要素

等新型生产要素相对不足,且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投入能够互补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因此增加一单位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投入会带来更高的边际产出,因此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丰富的平台经济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更好、程度更高。

第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平台经济与乡村振兴水平都更高,由于本身发展水平基数较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的相对比例更低。

第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平台经济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而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仍处于对新兴技术的应用阶段^[56],相对而言,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果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见效更快。

第四,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具有后发优势,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示范性经验能够给其带来经验借鉴,并且由于平台经济、数字技术的特殊性,使得平台经济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一经应用就可以得到迅速推广。

第五,在数字乡村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背景下,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西部、北方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具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为依据,分析了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完成了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的指数测算。进而选取乡村振兴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口规模、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失业率为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对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该研究结论通过对变量缩尾处理、更换样本区间等方法验证后仍然稳健。

第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通过推动城乡融合间接促进了乡村振兴。但是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的回归系数仅在5%的水平上显著,原因是在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面临城乡数字鸿沟的约束。由于数字技术是平台经济的核心要素,城乡数字鸿沟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口数字素养较低的乡村地区难以共享平台经济的数字化红利^[9],制约了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

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存在区域异质性,且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效果优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可能的原因包括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边际产出递增与要素互补性差异、发展水平基数差异、创新驱动与技术应用阶段差异、后发优势与经验借鉴影响、国家政策支持影响等。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强化其在涉农领域的技术创新应用。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平台经

济治理体系、优化平台经济营商环境、保护平台经济用户个人信息、保障平台从业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发展,提高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着力填补平台经济在涉农领域的技术空白,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与农业生物技术创新^[9],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并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普及与应用,提升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效能。

第二,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弥合城乡区域间数字鸿沟,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的可及性,提升乡村地区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弥合城乡群体间数字鸿沟,加强乡村新型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着力引进培养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农业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提升乡村人群整体数字素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对于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创新融合,推动平台经济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对新兴技术、智能设备应用,充分借鉴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示范性经验,充分利用国家对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政策,进而加快平台经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应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J]. 求是, 2022(7): 4-17.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4-02-04(1).
- [5] 唐任伍. 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价值内涵和未来图景[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15): 18-31.
-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2-05(1).
- [7]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05-17(7).
- [8] 张蕴萍, 栾菁.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 改革, 2022(5): 79-89.
- [9] 唐任伍, 马志栋. 平台经济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机理、实施路径与对策建议[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3, 39(4): 31-40.
- [10] 唐任伍, 马志栋. 平台伦理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矫正对策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4, 40(2): 59-71.
- [1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3-08-28) [2024-04-01].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 [12] 唐任伍, 马志栋. 平台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实践模式与路径选择[J]. 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 2023, 2(1): 60-70.
- [13] ROCHET J C, TIROLE 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4): 990-1029.
- [14] CAILLAUD B, JULLIEN B. Chicken & egg: 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34(2): 309-328.
- [15] ARMSTRONG 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3): 668-691.
- [16] 贺宏朝. “平台经济”下的博弈[J]. 企业研究, 2004(12): 20-24.
- [17] 史健勇. 优化产业结构的新经济形态——平台经济的微观运营机制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25(8): 85-89.
- [18] 谢富胜, 吴越, 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2): 62-81.

- [19] 芦千文. 涉农平台经济:典型案例、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5): 63-71.
- [20] 袁宇阳.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 电子政务, 2023(10): 71-83.
- [21] 朱冬睿.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情境与路径优化[J]. 上海商业, 2023(11): 13-15.
- [22] 佩蕾丝.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3] 文丰安.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现代化:重要性、梗阻及发展进路[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5): 134-141.
- [24] 夏杰长, 杨昊雯. 平台经济: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J]. 改革, 2023(2): 14-27.
- [25] 郭芸, 范柏乃, 龙剑. 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0): 118-132.
- [26] 杨伟国, 吴邦正.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4): 2-16.
- [27] 费威, 于宝鑫, 王维国.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J]. 经济学家, 2022(11): 74-83.
- [28] 纪园园, 张美星, 冯树辉. 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平台的视角[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2, 42(6): 1579-1590.
- [29] 颜长春, 廖俊. 中国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11): 5-10.
- [30] 沈坤荣, 张锐敏. 平台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12): 18-29.
- [31] 张挺, 李闽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8): 99-105.
- [32] 闫周府, 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 2019(6): 90-103.
- [33] 毛锦凰.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9(3): 47-58.
- [34] 李雪, 杨欣琦, 张伟. 民族地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基于 24 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 民族研究, 2024(6): 62-73.
- [35] 程聪慧, 刘昱呈. 平台经济发展与农村创业活跃度[J]. 科学学研究, 2024, 42(10): 2138-2149.
- [36] 周兵, 李艺, 张弓.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J]. 中国流通经济, 2023, 37(7): 3-16.
- [37] 田野, 叶依婷, 黄进, 等.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10): 84-96.
- [38] 周佳宁, 秦富仓, 刘佳, 等.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9): 166-176.
- [39] 孙群力, 周鏖, 余丹.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5): 26-36.
- [40] 赵云辉, 张哲, 冯泰文, 等. 大数据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J]. 管理世界, 2019, 35(11): 119-132.
- [41] 陈时见, 胡娜.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5(3): 69-74.
- [42] 牛耕, 向雪凤, 周洋. 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1): 82-103.
- [43] 沈坤荣, 张锐敏. 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11): 86-103.
- [44]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8): 5-23.
- [45] 肖远飞, 周红叶, 韩先锋. 数字贸易何以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 26(6): 18-34.
- [46] 王菲, 孙淑惠, 刘天军. 数字经济发展推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吗——来自黄河流域地级市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9): 122-143.
- [47]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48]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 地理研究, 2018, 37(11): 2127-2140.
- [49] 孟维福, 李莎, 刘婧涵, 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J]. 经济问题, 2023(3): 102-111.
- [50] 徐维祥, 舒季君, 唐根年.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进[J]. 经济学动态, 2015(1): 76-85.
- [51] 程名望, 贾晓佳, 俞宁.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61-172.
- [52] 李佳谔, 陆大道, 徐成东, 等.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48-160.
- [53] 冯苑, 聂长飞. 中国共同富裕的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 43(12): 65-84.
- [54] 李征召, 韩宁, 赵德昭. 经济增长目标与专项债务限额使用[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8): 3-16.
- [55] 彭桥, 杨蕴钰, 陈浩.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演化与驱动因素[J]. 统计学报, 2025, 6(1): 17-31.
- [56] 唐娟, 王华, 秦放鸣. 中国创新驱动水平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4): 56-61.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Platform Economy: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ANG Renwu, MA Zhid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crucial task to achie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all-a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e platform economy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as the core is a new engin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Based on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ppli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n, it us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employ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for indicator weighting and index calculation.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how the platform economy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can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Second, althoug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rocess also faces constraints from the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Third,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This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fu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First, it is crucial to promote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strengthen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Second, it is essential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ffectively fulfill the rol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leverag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region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veal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tform economy as a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ag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going beyo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one-dimensional attribute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Second, it discusses the key rol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reveals that this empowering effect is constrained by the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Third,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rginal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hat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are dominated by developed regions. Moreover, this analysis propos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factor complementarity and latecomer advantag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polic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tform econom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魏小奋